



用书铺成的路

此间收入的文字，涉及了笔者跟书籍的种种缘分，而把这些文字有头有尾地接在一起，就勾勒出了一个关于书与人的很特别的故事。

刘 东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用书铺成的路

刘 东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用书铺成的路 / 刘东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9

ISBN 978-7-301-17701-3

I. 用… II. 刘… III. 学术思想—研究—中国—现代 IV. B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67303 号

书 名: 用书铺成的路

著作责任者: 刘 东 著

责 任 编 辑: 岳秀坤

装 帧 设 计: 奇文云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301-17701-3/G · 2938

出 版 发 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philo@163.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5

印 刷 者: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mm × 1230mm 32 开本 10.25 印张 208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目 录

1	我的用书铺成的路（代序）
16	理论之上的心智
36	千呼万唤“阅读传统”
45	正是读书好时机
52	我们思，故我们在
56	写作是最好的解脱
59	“四十不惑”的苦涩
64	学着思想
70	回到轴心时代
77	一本越陈越香的书
81	人生就是不断受戒
105	双重折磨中的坚忍家学

- 110 放眼海外重新认识中国
- 112 对话中变迁的“中国”
- 115 今宵梦醒何处？
- 128 舞蛇者说
- 147 十年甘苦寸心知
- 157 熬成传统
- 167 谁在思考？为何思考？
- 181 终于可以平心阅读日本
-
- 187 咬穿文化的篱笆
- 190 中国问题原是世界难题
- 193 从人文思入社会
- 198 老书新序
-
- 202 诗与思的相克相生
- 205 “为公”与“营私”的周期转移
- 210 对任何书都要“会读”
- 217 保持视界的弹性
- 222 不应叫停，而应道贺

227	历史学也在创造历史
234	可能性的代价
238	贱民的歌唱
248	道德资源：中国发展的瓶颈
252	韦伯情结是中国学界的“共通心病”
259	出版业中的学术人
267	中国大陆学术出版的现状
281	中文能否成为国际学术的工作语言？
291	学者和他的学术书店
296	保住我们的出版特区
299	出版早比教育前卫
304	不求一荣俱荣，却防一毁俱毁
307	雪球还要滚下去
312	“中国文化的修养”
315	守望文化的精魂
320	欣赏其中的每一个细节

我的用书铺成的路

(代序)

此间收入的文字，涉及了笔者跟书籍的种种缘分，而把这些文字有头有尾地接在一起，就勾勒出了一个关于书与人的很特别的故事。

这故事要从刚刚摆脱目不识丁时说起。到现在我都还能记忆犹新：自己最早是从小学周边的画书摊上，以一分零用钱租一本的价格，接触到了一个陌生而不无神奇的世界！——那样的世界，曾经只能缠着家长讲给自己听，也曾被感动得睁大眼睛、乃至流下热泪，可突然间，就凭画框下的那两行小小的方块字，便可以自由自在地钻进画面里，要么跟八路军一起去打游击，要么跟孙悟空一起去闹天宫，多么叫人喜不自胜呀！自此之后，就算是领悟到了文字的魅力，再不觉得学着识文断字是什么苦事了。

但很快，我又很难满足于薄薄的画书了，觉得究竟还是纯粹的“字书”（按我们当时的说法），更耐读也更过瘾，正好比先在游泳池扑腾了一气，而终究要狠心丢掉救生圈一样。在自己的那个班上，我

是最早迷上这种印满文字的故事书的。其实当时还只念到二年级，一多半的字都还不认识，就一天到晚捧着《说岳》、《水浒》之类，充其量也只是囫圇吞枣罢了，再加上自己的想当然。——若问怎么个“想当然”法？记得有一回，我居然在饭桌上信口开河，说自己刚从书上看来，孙悟空的本事大到什么程度？竟可以从直升飞机上纵身跳下，逗得父母亲相视大笑！

即使到了今天，只要能独自猫在什么地方，随着性子打开书本（千万不能有什么硬性的任务），我马上就能找回当年的兴奋感，觉得它丝毫也未曾减弱。而且，不开玩笑地说，就连自己后来在北大的教书风格，也至少是部分沿袭了当年的那份荒唐劲儿。比如，谁也不会像我这么喜欢大批量地胡乱买书，这么喜欢任意抄起一本不相干的杂书来，这么喜欢向学生强调触类旁通的重要性，——更何况，我还无论开读什么样的书，都很难完全忠实于它的内容，总喜欢添枝加叶地恣意发挥，并且也只是在谈及这些独创的发挥时，才能真正提得起精神来……

但无论如何，对于书籍这东西本身，我还算是相当忠实的，甚至都可以说，也许再没有别的什么，能让我爱得这般永不反悔从一而终。正是出于此种心结，记得刚参加过1977年的首次高考后不久，我便喜出望外地发现：如果以前非要干完别的活计累得筋疲力尽，把糊口和买书的钱挣回来，再来满足读书的兴趣，那么，从今往后居然只要把书读好，就蛮可以借此谋生了！——这意味着什么呢？自己的生活从此将不再分裂、不再异化，而是如马克思所憧憬的那样，去尽享劳动过程本身，这是何等样的福分呀！

在这个意义上，自己走到了今天这一步，不管犯过多少傻，留下多少遗憾，大体上也还算是求仁得仁的。这当然不是指任何外在的功名，而是指跟大多数同龄人相比，自己总还算读过较多的书，而且借助于书籍载来的信息，自己也总算对世界有了较多的了解。——更不必说，自己还常借助于文字和书本，来表达对于世界的独特理解，甚至也同样用这种媒介当作触角，到地球的各个角落去广结善缘，正如我在一篇文章中所感叹的：

在利欲熏心的年代选择做学问，不管有多少亏要吃，但至少还有一件事，那是官场和商场都比不了的，这就是你可以广泛地以文会友，甚至到整个世界的范围内，去寻找跟你志趣相投和智力相等的朋友。这样，你所拥有的至情至性的知己，肯定要比那些毕生以尔虞我诈为业的人多得多。簇拥着这些朋友，你不仅可以增容头脑、同商大计、共享情怀，还更可以像齐美尔所说的那样，在社会交往的游戏形式中，享受到接近美学标准的快乐。在那样的时刻，你甚至会搓搓双手踌躇满志地想到，人还没准真是一种高等动物罢？

（《未尽的文字缘》）

我是6岁半开始上小学的，所以若从2年级算起，那么已经要不了几年，自己跟书籍的这种缘分，便已持续半世纪之久了。而人生一遭，顶多也只能以百年来计量罢？所以吊用一个句式，这也可以说是“半生书缘”了。而回顾起来，在这半辈子的磨难中，也曾出

现过两股强大的外力，非要切断这种不解之缘不可，值得在这里说道说道。

头一次危机，发生在“史无前例”期间。校园里成天批来斗去的，不一而足。然而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既不是批判帝修反，也不是打倒刘邓陶，而是声讨所谓的“读书无用论”。当然，在我这个小书迷心间，从来就装不进这种论调，而且既已被公开批判，也没见谁公开认下它。不过，最不会出错的反向理解却是，既如此高分贝地批判它，刚好也就反过来验证了，此种看法肯定暗中很有市场。正如当时的高音喇叭，整天在强词夺理地吼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嗨——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来——就是好……”那也无非是说明了，大家虽则嘴上不说，暗地里都不看好这场运动！

要想就此不再沾书本，当时已有太充足的理由了：外边已然是焚书坑儒，家里又被抄得一千二净，本人还属于黑五类子女，很快更被分配到最脏最累也最潦倒的翻砂车间。然而，私下里对图书的这份挚爱，却不仅未曾稍有动摇，反而愈发浓烈痴迷了。为了抢读一本偷偷换来的小说，我可以彻夜挑灯不眠；为了留住一本限期归还的诗集，我可以手不停挥地赶抄；为了得到一本超出购买力的书册，我更会毫不犹豫地卖出仅有的菜票，情愿为此啃上一星期的干馒头！此外，尽管当时浑身上下也只剩一身工作服，还往往沾满油泥，我仍喜欢在出门的时候，特别是趁着天色已晚，往胸前别上一支钢笔，于腋下又夹起一本厚书，无论那做派多么不合时宜，——或许正因为非要这样，才可以标示出偏不要跟上时宜！

更有甚者，我那时虽说还没读过多少书，因为根本没有多少书可看，可是打从内心深处，却一直把自己认同于读书人，而且，越是严厉地讨伐那些“反动学术权威”，我就越是悄悄崇仰那些权威，因为这名号意味着，人家肯定是读过最多的书，——当然，那时就连做梦也不敢想，自己有朝一日，也能成为这样的权威！下边的这段话，就是基于当时的记忆：

我们都还能记起那个几乎无书可读的黑暗年代。可回想起来，那如磐暗夜中却又不乏篝火般的亮色：比如在当时，我们文明由来已久的“阅读传统”仍在惯性地残存，从而对于书籍的饥渴也仍在人们心间一息尚存。有了这种渴望，大家才会冒着风险去访书、借书、换书、抄书，并在“雪夜围炉读禁书”的特有兴奋中，悄悄地享受着“与知识偷情”的无名快感。（《千呼万唤阅读传统》）

构成了鲜明对比的是，尽管当时读得肯定没那么系统，经常是借得上卷却没有下卷，可直到后来执教北大之后，我才惊诧地发现，原来当年“与知识偷情”的结果竟是，反倒比现今很多中文系的研究生，实实在在地念过更多的世界名著！——说穿了，尽管她们（他们）的嘴皮子也得到了武装，可以通过要求标准答案的考试，然而真正触摸过的，却多是一些公式化撮要的教科书，由此真正接触到的，也无非是些梗概或骨架。正是基于此种对比，我才会在上文中大彻大悟地写道：“原来一种无形的阅读传统，一种曾经支撑过整个

文明的对于‘书香’的普遍陶醉，要远比千百万本摆放在书架上的实物来得重要。”

紧接着的二次危机，发生在90年代初。有意思的是，自己似乎命里犯一个“革”字，所以上次的困扰来自文革，而这次的困扰又来自改革，——当然是因为这不过是单向度的、只注重经济速度的改革！有的念书人，上回见面时还比你更寒酸，这回却一猛子扎到海里，红光满面地把行头全换了，还就用塑料袋子不经意地拎着巨款，倒过来可怜你——“到底怎么吃饭哇？”而这样一来，尽管你并非真的吃不上饭，但在那种故意投来的鄙夷目光中，却突然意识到了戏剧性的反讽：要么就得出去混得什么都有，捎带着也多置办几间书房，而唯独不再享有读书的时间；要么就继续手不释卷下去，像爬雪山过草地那样去坚持，却要忍受连间像样的书房都没有！

真的，中国的变脸实在太快！虽说只是不到二十年前的亲历，回忆起来却已恍若隔世了。想当年，针对社科院的备受冷遇，不知流传过多少冷嘲热讽，而且大多都出自同事们自己。比如，外文所的童道明教授，在会场上就曾顺口编出一个自嘲的笑话，来极言研究人员的待遇之低——“据说从王府井往东走，想挣四百多块的，可去北京饭店当服务员，想挣三百多块的，可去电讯局当接线生，想挣两百多块的，可去收费厕所当看门人，只有想挣一百多块的，才去社科院当研究员！”再比如，杂志社的老同学孙辉，在电话里也曾信口讲过一个自虐的笑话，来夸张本院同行的狼狈相——“远看像个要饭的，近看像个逃难的，一问却是社科院的！”

唯独我本人，就算没那么神气活现，也没觉得比别人窝囊到哪

里去。——说实在的，自己虽也虚与委蛇地跟着嚷嚷两句，暗地里早把事情给想开了：你又没替人家做什么事、创什么收，一天到晚净顾着朝自家肚子里读书；而他们好歹还供给你一碗总算饿不死的饭、一套虽说稍微逼仄点儿的房子、一份生了病总还可以开点药的保险，这也算够意思了吧？再说，你如果笔下勤奋多出文章，总还能换得些许润毫，那就更是不无小补了。所以，完全没必要去怨天尤人，而只需转过念来，把自己想象成最具中国特色的、难得被白白养活起来的“专业作家”，——尽管是只能写作不大赚钱的学术论文的作家，——你就会发现自家有多幸运了！

事后回顾，若跟香港那边拿钱过多的（overpaid）同行相比，其实一个人文学者在出道之初，稍微保持一点儿饥饿感，反而是大有好处的。这还真不是什么酸葡萄心理或者阿Q精神，其道理正好比大凡养鱼的行家，总会在箱底放一条猛追乱咬的黑鱼，以使整个鱼群都摆脱慵懒一样。当然，前提是你须臾也不能离开学术的正业，而只要这一点咬定了，那么，哪怕你只是为了按时付出房租，或者为了多买几张唱片，而每年额外构思两篇文章，和每两年额外翻译一本书，十年之后再盘点，你就会意外地发现，居然额外多出版了两大本专著，外加五大本译著；更不用说，假如你更加有意识地挑战自己，那么仗着自己反正时间有的是，也许还可以借机多打通一两个专业，和多通晓一两门外语！——当然，说来说去，关键还要真心爱书，不然光靠这么扒拉着算盘珠子，是决然熬不到脱颖而出的。

此外，又不瞒大家说，就我个人的机遇而言，还意外保有了另

一种可以“创造性转化”的制度遗产，所以竟能以驾驭图书市场为手段，来部分对抗急速的市场化，抵消它在文化方面的短视效应。——而此种制度遗产，正是自己从 80 年代以来就积极参与的种种“丛书编委会”。就此，我曾在一篇针对哈佛师生的讲演中，现身说法地分析过这种生存技巧：

学者们通过组成编委会这种松散的团体，加强了自己的知识优势，从而获得了影响出版社的能力，基本上掌握了实际的选题权和审稿权，更容易在图书出版中贯彻自己的理念。出版社也通过跟编委会签约，不仅一次性地确保了许多优秀选题，降低了外部的交易成本，而且实际上拥有了一个阵容强大的“编外编辑室”，降低了内部的管理成本。说到底，这种合作形式反应了在两种体制间的特殊生存技巧，因为学者们属于计划经济的“事业单位”，而出版社却是市场经济的“企业单位”，算是“铁饭碗”和“泥饭碗”的互补。

（《中国大陆学术出版的现状》）

当然，如果并不想就此把这份清高出卖掉，那么就算被迫要到图书市场里蹉浑水，也必须为自己设置一个严明的底线——那就是不管内部阻力如何、外部诱惑又如何，也坚持只推荐最有价值的学术著作，正所谓“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耳！记得当年创办《东方》杂志时，就有人把我这种一口咬定的坚持，断为“迂腐”和“偏执”，觉得根本就成不了事。然而所幸的是，正过来说，咱们中

国的人数毕竟很多，就算读书的风气不浓，也总还保有不小的读者群，足以支撑学术著作的基本印数；反过来说，咱们中国的人数虽则很多，照这般负隅顽抗的人却又不多，终究让几个咬紧牙关的同侪，到头来反而显得“以稀为贵”了。从这个意义上，或许是当今最爱读书的一位卖书人，就发明了下述把我和小枫并称的说法：

组成一个编委会，拥有很大确定选题的自由空间，连续出版（多年、多种），滥觞于“走向未来”丛书。1989年以后，这样的丛书，很多，但最耀眼的，是南北二刘主编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刘东，江苏人民）、“人文与社会”译丛（刘东，译林）、和“经典与解释”（刘小枫，华夏、华东师大）、西方经典注疏集（刘小枫，华夏、华师大）。二刘都是八十年代启蒙运动的宿将，参加过多种丛书编委会，并有著作产生影响——《西方的丑学》（刘东，四川人民“走向未来”丛书）、《拯救与逍遥》（刘小枫，上海人民“人文研究”丛书）、《诗话哲学》（刘小枫，山东文艺）。（刘苏里：《30年，人、书籍与社会》，载《新京报》2009年2月16日）

说到吃紧处，其实真正重要的并不在于，你终于倔强地做到了，坚持把抢先阅读更多的好书，作为一种辅助的谋生手段，来坚守自己选定的读书生涯，——真正重要的毋宁在于，正因为当初非要咬住劲不可，多下了很多超常的苦功，所以你自己的人生道路，回顾起来反而显得长一些！迄今为止，上文提到的江苏人民出版社那套

书，已经凿凿实实在在地印行了109种，若再加上正待推出的选题，总数更已达到155种，故而在整个汉语阅读世界中，无疑是收纳了最多的国际汉学名著；而上文提到的译林出版社的那套书，也是厚厚重重地出版了75种，若再加上有待出版的选题，总数也已达120种之多，从而在整个汉语阅读世界中，同样是引进了最多的政治哲学和社会思想名著。说真的，面对这两大套摞起来比我还高的学术名著，再联想到它们今后必会对公民文化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你是不可能不这样暗自庆幸的——多亏当年没有跟从别人、浑浑噩噩地流落到海外去呀！唯其如此，本书开头那篇访谈中的那种语锋，才并非故作惊人之语：“说来也许你难以置信，我一生中可能有很多的幸福和不幸，但其中最人的幸福，那就是没有出国，——出国的那些人大多对人文学术世界来说就算是消失了。”（《理论之上的心智》）

由此一来，数十年如一日地向出版社推荐好书，并借助它们的热情将之推广到社会，这对于我本人而言，就不光意味着市场大潮下的自救手段，还更意味着一位书生苦苦找寻到的、效力和回馈社会的独特手段，——而这也就是我自己的路，一条不得不去跟社会反复磨合协商、却又自始至终都不离开书本的路，或许干脆说，一条用书铺成的路！当然，若跟最让我心折的朱可夫大将的盖世奇功相比，这么一条“百无一用”的羊肠小道，实在算不上什么高潮迭起、荡气回肠的履历，尽管它仍不失为一条独辟的蹊径。而唯一能想到的安慰则是，若跟安定或正常治学条件下的读书人相比，偏是这个经常叫你安不下一张书桌的动荡背景，也勉强算得上一个乱世英雄起四方的年代，它迫使一位书生把根扎得更深，从而使其生平

显得更多元和更丰足。

让人喜出望外的是，自己这种简直有点固执的阅读行为，一旦坚持下来，就不光是在满足着一己之个人兴趣了，而更有意无意地晕染成一种公共的读书氛围。在这里，要首先刻划一下国内知识生产的基本现状：如果说在1980年代，我们的教育界曾经领先于出版业，缘此才从几所名校中冒出了一批才俊，以丛书编委会的自由结社形式，把他们从老先生那里学到的知识，通过书籍的媒介传播到全国去，那么自1990年代起，由于这边更听命上峰而那边更尊重民间，我们的教育界竟早已落后于出版业了。别的不说，仅就我个人的亲身经历而言，就连最享有自由的北大中文系，也早被僵化的学科和陈旧的教材给封冻了！为此，我们只好被迫养成了这样的习惯：不是先在课堂上试讲某种新的内容，尔后再以北大的研究室为圆心，把这些新观念扩散到社会去，而是彻底掉转过来，先在出版社推动一个计划，让相关的图书铺天盖地而来，包围北大周围的各个书店，并逐渐形成社会思潮的热点，再拿到课堂上水到渠成地推广它，说穿了无非是让出版的企业来推动教育的事业……

仿佛有些侥幸：尽管上述严峻的事实，对于任何正常的社会秩序而言，都肯定是颠倒的甚至错乱的，然而，由于自己身跨出版和教育两界，所以尽管现状相当不令人满意，仍然保留了相对完整的工作流程。对于这一点，自己近来在一篇序言中是这样描述的：

幸赖出版界朋友的接力与后援，使我终于活到了这样的境界：不光是私下里热爱这些图书，而且每当读书读到兴